

一部研究农业发展问题的力作

——评郭熙保的专著《农业发展论》^{*}

张翠徽

农业是经济发展的母体和起点,这是从我国以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的共识。忽视农业发展而一味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很有可能会动摇国民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样,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如果忽略农业发展问题,其理论体系的基础必然是浮浅的,其实用性也必然是脆弱的。近年来,国内外对农业发展理论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大成果,但是,吸收西方农业发展理论中的合理内涵,并与我国的农业发展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系统介绍和研究农业发展理论与政策,这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基本上还无人问津。郭熙保早在80年代后期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于1990年在哈佛大学进修期间主修发展经济学和农业发展理论。回国后,作者潜心研究、辛勤笔耕,完成了《农业发展论》这部专著。该书集中了作者数年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结晶和最新成果,可称之为研究农业发展问题方面具有特色和理论贡献的一部力作。

该书的特点之一在于结构体系设计新颖。从外部结构看,这部32万字的著作,理论框架清晰,逻辑关系严密。从内部结构看,作者溶材料与观点于一炉,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为一体,运用丰富翔实的统计数字和文献资料,进行了周密严谨的归纳分析和理论

论证,从而使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参考价值。比如第二章论述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时,在拥有国内外丰富而可靠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上,作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相对地位下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任何国家和地区在任何时期农业部门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对重要性下降,而且,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农业相对地位下降得也较快,经济增长较慢的国家和地区,农业相对份额也下降得较慢”。在归纳分析和理论论证的基础上,作者还引入经济数学模型,对我国在未来几十年中农业部门相对地位下降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和展望,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都颇具特色。

特点之二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作者以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放眼世界的同时密切关注我国的经济发展,将农业理论研究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作者突破了国内以往研究西方经济学中以介评各个代表人物及其理论为主,忽视应用性研究的倾向,没有着墨于对农业发展的所有问题进行面面俱到的介绍,而是在简要回顾了发展经济学中农业发展思想的演变的基础上,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其

* 郭熙保著:《农业发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中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可以引以为鉴的理论,作了深入的阐释和精细的剖析,并把中国的农业发展问题作为其研究和分析的落脚点。不仅重点突出,主次分明,而且体现了理论探讨、实证分析和对策研究“三位一体”的特点。

例如,在分析现代农业增长的道路时,作者首先对梅勒的“农业发展阶段与资源互补论”和速——拉模型即“诱导的技术变革与资源替代论”作了较为透彻的介绍和评论,认为速——拉模型比梅勒的理论更具有一般性和适用性。然后,作者对各国的农业技术进步道路作了历史考察和实证分析,得出“在地多人少的国家,通常可以走机械进步为主要的道路,而在地少人多的国家,则应该走生物技术进步为主要的道路”这一结论,并提出“以生物技术变革为特征的绿色革命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上述理论评介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作者结合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道路,对主张“中国农业现代化要走生物技术和机械技术并举的道路”的观点提出大胆置疑,认为“中国农业只能走生物技术进步为主,辅之以农业机械技术发展的道路”。这些观点对于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特点之三在于广泛吸收了西方农业发展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并在一些领域提出了自己的独创见解。具体而言,主要有三点分析给人以深刻印象。

其一,对于今天不发达的国家来说,最稀缺的要素是资本,而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即为资本贡献。作者在分析农业资本流转核算体系时,对费景汉和拉尼斯提出的部门间资本流转核算体系给以充分的肯定,并对在此基础上由李登辉发展而成的李氏体系作了系统的介绍和重要的修正,指出李氏体系按不变价格来计算农业实际资本流出的局限性,并提出一个调整部门间资本流动的新方法,即用两部门平均每个劳动者净产值这一指标来调整农业资本转移数

量,充分考虑了劳动生产率和价格这两个因素的变化对农业实际资本净流出的影响,从而使资本流转核算体系更趋科学,并能正确地反映农业部门的资本贡献。

其二,有关发展中国家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的问题,在国际学术界争论不一。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古典学派认为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丰富的剩余劳动力,把他们转移到非农部门中去不会使农业总产量减少,因为这些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低到接近于零。与此相反,以舒尔茨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则否定农业中有剩余劳动的存在,认为如果从农业中撤出劳动力,势必会减少农业总产量。两派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了很长时间,后来,有些西方经济学家通过区分就业人数与劳动时间而把两派观点调和了起来。作者认为,两派观点之所以分歧,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区分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和劳动时间的边际生产率,并对农业剩余劳动提出一个新的判别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就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这个新定义把重点放在劳均耕地面积上,比着重点放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上的传统定义更为容易观察和判断一国(或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可以说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大贡献。

其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上,作者引入刘——拉——费模型,说明工业化是促进农业生产率增长和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并通过大量实证分析,证明了农业与工业的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不仅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工业部门也为农业部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作者着重分析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原因及其消极影响,并对促进我国农村城市化提出了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对于决策部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 杨宗传)